

憶戰時陪都重慶

趙宗鼎

重慶精神驚天動地

積雨還晴鎮日陰，交車大道走駁駁。
依山樓勢爭高下，隔霧嵐光遞淺深。
赤足并餐艱半飽，紅顏薄笑陋千金。

嘉陵江水無情碧，漫與時人話賞心。

上面這首詩，是抗戰時期在重慶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詩人所寫的，它詩中所指，雖然對當時陪都有所褒貶，但並不是泛指一班軍公教人員，所謂「赤足并餐艱半飽」，當然是指淪陷區的民衆追隨政府撤退，而流離失所的情形，「紅顏薄笑陋千金」，則凡是在後方的人，一望就知道是發了國難財的商人賺了不義之財，就在後方花天酒地的寫照，我記得當時重慶流行着這麼一句笑話「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也是形容這班囤積居奇而暴富的揮霍狀況，其實當時各級軍公教人員，憑良心說是够艱苦的，二十九年六月間，駐防重慶的憲兵第三團團長袁家佩兄他曾經告訴我一個感人的故事，他說有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有四位憲兵同志在兩路口（地名）附近的馬路

口執行勤務，發覺路上有一位身着將官制服的軍官，肩上背着一袋大約有三十多斤重的食米，走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憲兵同志乃上前恭恭敬敬向這位將軍行了一個舉手禮，很禮貌的看了這位將官的軍職證件，同時並詢問他着制服在馬路上背米的緣由，這位將軍的答復到很乾脆，他說：除軍服之外沒有便衣，家累很重無力雇人代運（因為當時尚沒有做到補給到家）憲兵同志瞭解原因以後，乃毫不遲疑的問明他的住址，把這位將軍肩上的食米接了過來，隨同背送回家，事後據憲兵同志的報告，這位將軍的家裏，雖然住的是竹子細綁的瓦房（重慶在戰時山坡地帶的違章建築，很多都是用竹子細綁而成），「一家六口一張床」，到還整理得十分乾淨，絲毫沒有凌亂的跡象，面黃肌瘦的太太正在劈柴燒水等待將軍運米回來下鍋，孩子們也很天真的坐在床上溫習功課，房裏甚麼陳設都沒有，唯一的就是一台竹製的書架，上面列擺有各類的書籍很多，頗有「室雅何須大」，「書香我自娛」的氣概，其實在抗戰時期像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還很多，但他們都能

甘之如飴，從不抱怨的理由，就是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全國上下軍民一致都相信委員長 蔣公領導正確，最後勝利必定是屬於我們的，大家都緊記着 蔣公在廬山所講的一句話：「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在蘆溝橋的槍聲響了以後，全國軍民都知道犧牲已經是到了最後關頭，所以大家都是熱血沸騰，義無反顧的來從事艱苦的抗戰工作，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當時民心士氣的慷慨激昂，誠可以用「驚天地而泣鬼神」這句話來形容並不為過，自從南京淪陷遷都重慶以後即以大後方四川一省而言，他們早已停止內戰糾紛，徵兵徵糧出川抗敵，萬眾一心在委員長 蔣公指揮下前仆後繼勇往直前，貢獻犧牲均極重大，其他各省毀家紓難，投筆從戎的悲壯故事，更是書不勝書，這種精神恐怕不是在富庶安定中成長的青年都能體會得到的。

最近半年因為世界普遍發生「能源」問題，我們國內的輿論，海外的華僑，都在喊出「節約應付，渡過難關」必須重振「重慶精神」的口號，重慶精神的可貴究竟在那裏，為什麼值得重振起來



戰時陪都重慶青年婦女很少有濃裝艷抹的打扮，她們的衣着，不分冬夏，多半是一襲陰丹士林的無色旗袍。

，現在事隔

三十多年，

曾經到過重

慶長一輩的

人，多已老

成凋謝，中

年人因為當

時尚在學生

時代印像不

深，加以我

政府厲精圖

治，二十多

年來突飛猛

晉，已躋為

東南亞第二

經濟大國，

國民所得日

益增高，席

豐履厚，予

取予求，早

已不知節約

為何事，如

果不是世界

「能源」恐

慌的波及，

誰也不會想

到重慶的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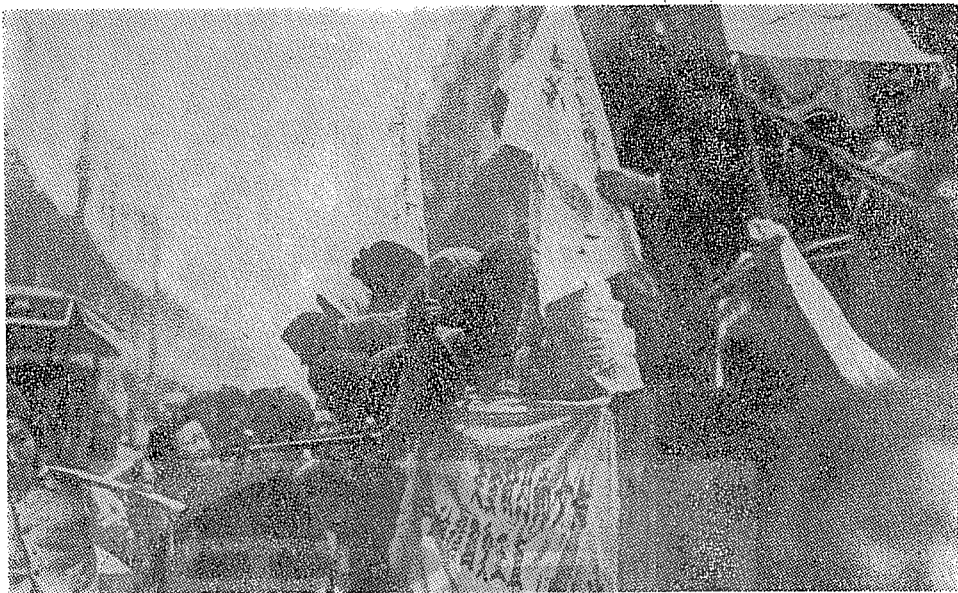
難精神，現

在筆者特就

記憶所及先來談談：

手工零件陰丹士林

我首先要談的就是克復「能源」問題的精神，在抗戰時期「能源」二字尚未發明，當時唯一的辭彙就是「物資缺乏」，因為自從上海南京相繼淪陷，而我國沿海商埠又先後淪於敵手，遷都重慶以後已無海口可資利用，外來物資極感困乏，在滇緬公路尚未全部修通以前，所需汽油必須經由印度「加爾各答」用運輸機空運，飛越「駝峯」到達昆明，再由陸路經過貴州省境運來重慶，故當時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警惕口號，所有運抵重慶的汽油，嚴格規定一律以軍用為優先，非經特准不能別用，在後方公路局的汽車，多數改為燃燒木炭及用酒精替代，雖然速度比不上汽油的力量，到底還是聊勝於無，我記得由重慶到成都，汽油車兩天可以到達，第一天宿在內江，第二天下午即可到達成都，酒精車尚可免強應付，遲到至多亦不會超過五六小時，木炭車則非三天甚至四天不可，當時重慶某報曾經幽過公路局的客車一默，他們在副刊上寫了這麼一首歌詞「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真是諷刺得啼笑皆非，其實在當時汽車零件也是一個絕大的問題，因為外國所產的汽車，除了廠牌不同的問題以外還有年份問題的存在，比如一九三八年出廠的汽車，到了一九四一年他們廠裏就不再製造這種零件了，何況我們用的汽車還是一九二幾年的古董，事實上就是找遍天下也是配不到這種零件的，所以我不得不由衷的佩



大專學生愛國青年在陪都重慶街頭勸請同胞父老獻出金銀，充作抗戰軍費。

服在抗戰後方，這些天才汽車的修護人員，他們能挖空心思想出辦法，用手工來模仿製造各種零件，唯一的缺點就是鋼質不精，走不了多久就會斷裂，但是他們真有一套，隨車攜帶備用的零件很多，壞了就換，引擎發不動，立刻就請車上的乘客下來，「羣策羣力」的推，推到發動上車再走，達到了陡峭的山坡引擎力量不夠，也請車上的「貴賓」下來「安步當車」爬過山嶺再上車前進，不管在路上耽擱多久反正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總以將客人送到目的地為止，充份發揮了同「車」共濟的團隊精神，你能說這種克難節約的精神，不令人為之肅然起敬嗎？

重慶時代的衣着方面，雖然在堅苦的節約中仍有其整齊嚴肅的一面，軍公教人員中除了外交人員外，很少有西裝畢挺的，絕大多數都是一套中山裝，毛織品還不多見，一班太太們因為在國難期間很少有濃裝艷抹的打扮，不分冬夏多半是一襲「陰丹士林」的無色旗袍。

重慶很少洋烟洋酒，最高尚的酒類，除了貴州出產的茅台以外，就是瀘州生產的大麵，土產的華福牌香烟已算是最高級的享受了。

戰時重慶的餐館及娛樂根本談不

上够水準的享受，既無舞廳，復無豪華酒店，唯一的西餐館就是一家在公園附近的永年春，較大的中餐廳也只有在下半城的暇娛樓一家而已，他們店裏除了喜慶及招待外賓舉行的宴會以外平時多半是門可羅雀的，小吃店到還不少，如本地的九園、十園等，每天在十一時左右就把「開堂」的牌子掛了出來，一盤滷菜四兩茅台的顧客到時常是高朋滿座的，毛肚火鍋店也是重慶的一景，不分冬夏木桌的中央擺上一爐木炭引燃熊熊的烈火，爐上放一小鍋內注濃湯和辣醬，四週都是一碟碟的肉薄片、牛肚、牛腦等：真是玲琅滿目，他們坐下來吃，並不過癮，要用腳踏在櫛上吃得滿頭大汗，尤其是在夏天吃得揮汗如雨的時候，還有人在傍用大蒲葵扇為你打扇真是有趣得很，在這裏消費的人很少有外省的朋友，因為他們受不了這種濃烈的辣味，都郵街還有一家由上海遷來的冠生園，因為價廉物美生意到還興隆，可是經常消費的到不是公教人員而是地方的「紳糧」和商人了。

關於娛樂方面的平劇院，在蒼坪街附近有一家第一劇場，是以乾旦趙榮琛為台柱，厲慧良、厲慧敏、厲慧斌為主角的厲家班，則在小樑子附近的彰華戲院演出，還有一家山東省立戲劇學校的學生也間常露演，起先是在公園門口利用一座舊式公館房屋改裝的，祇能容納觀眾二三百人，後來遷到七星崗附近才將範圍稍稍擴大，生意並不佳，電影院首推在精神堡壘近側葉家巷的「國泰」，及公園對門的「唯一」兩家，他們多半上映國片，國泰雖放映西片，因為來源不易並不太多，我記得有一次放映了一部够水準的西片「藍天

轟動了半個山城，獲得不少的收益，國泰有時也演話劇，鄭用之主持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轄下的電影明星，如舒繡紋、白揚、金山，顧而已等間亦參加演出，票價不昂頗合大眾消費，在重慶時代的公教人員非常純潔，很少有不良嗜好，在公餘之暇有一段時期，因為前方節節失利，內心有些苦悶，喜歡坐坐清茶館來閑聊，不久有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清談誤國」的理論，唬得一班公教人員不敢再上茶館，祇好跑到公園裏打太極拳，呼吸新鮮空氣去了，你能不對這班忠黨愛國的軍公教人員致崇高的敬意嗎？

稻草造紙報館挨炸

到了民國二十九與三十年之間，因為前方戰事的日益緊張，敵機對我後方又不斷的空襲，再加交通的梗阻，人口的壓力，物資更感缺乏，如是應運而生的一班唯利是圖的商人專門找尋法律的空隙，走私漏稅，囤積居奇，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沒有遏阻他們在法律空隙中興風作浪，後來愈演愈烈，政府乃施以鐵腕先後成立了花紗布管制局，以清廉有為的尹任先先生為局長，三十年一月又成立了物資局，以精明幹練的何浩若先生（在台病逝）為局長，曾任財政部長及中國銀行董事長的陳慶瑜先生，及曾任台灣省財政廳長，中信局局長的陳漢平先生，都是當年重慶物資局的重要幹部，三十三年更加强了經檢大隊的權責，實施突擊檢查這班囤積居奇的不法商人，當時重慶、成都，自貢市三個經檢大隊都加强了編組聯合一致行動，重慶的大隊長是現在台灣的翁寧

三先生，他不顧威迫利誘，破獲了幾件轟動重慶的囤積大案，嗣後一直到勝利來臨，都沒有再敢以身試法來囤積居奇了，這就是當年重慶克復物資困難的大概情形，現在筆者再來談紙張及其他。

目前台灣因為紙張感到缺乏，報紙及雜誌都先後發出了嚴重的呼聲，甚至有可能因紙荒而發展到停刊的危險，這樣的問題在當年的重慶也會發生過，不但紙張缺乏，連油墨也有問題，可是情急智生，總有人能想出辦法來突破難關應付過去，紙張是用老法以稻草做原料來製造，沒有漂白粉來漂白，就不漂，造出來天然暗黃色的紙張一樣可以印出書報來，油墨也是用土法造出來的，印的報紙有的濃淡不勻，甚至一團墨跡掩沒了報上的字句，看報的人都會運用智慧來揣摩這掩沒字句的涵義，大家都知道這是在克難期間，絕沒有人寫信去責難報社，我記得在民國二十八年前後，重慶本地已有的報紙為新蜀報，西南日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等四家（可能尚有遺漏），由南京、漢口遷渝的，有中央日報、新民晚報、掃蕩報，由天津遷渝的有大公報、益世報（天主教辦的）由上海遷渝的有時事新報等，因為國

共合作期間還有一家共黨傳聲筒的新華日報，這些報社都是千辛萬苦，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來撐持的，當時有各類物資普遍缺乏的困擾，有隨時都會被敵機空襲炸毀的危機，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和四日，敵機大舉轟炸重慶，設在蒼坪街的西南日報，就是五月四日這天被敵機全部炸燬而再沒有復刊的，西南日報經理部的職員管相閣和排字房領班郭慶祿都是在被炸時僅以身免，他們

兩位都非常忠於職守，過去也是南京中國日報的老同事，西南日報被炸燬的這部機器，是南京中國日報在戰前剛自國外購回不久，那時中國日報的社長是顧希平先生（在台病故），社址是在南京明瓦廊，因為房屋陳舊，乃向報界先進成舍我先生租賃了他在中正路房屋作為社址，遷入不久就遭到西安事變，中國日報因故停刊，中正路這座房屋乃改為新生活俱樂部，抗日戰事發生，新生活俱樂部遷漢口，我奉命將這所房屋交還成舍我先生驗收，在點收完畢，我還記得我和成先生兩人親手抬一木槓將大門門好，才從後門黯然離去，舍我先生現在台灣，我想他定能記得這件印像最深的往事。

因為南京中國日報的董事長是康兆民先生，與重慶西南日報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南京淪陷以前康先生要他負責辦事處的翁寧三兄務必設法將這部機器和鉛字運到漢口，剛好翁兄另有任務，乃將這件事落到我的頭上，那時南京已很緊張，下關根本找不到船運，我祇好改由浦口從津浦路經徐州轉隴海路到鄭州再由平漢路南運到漢口，那時軍情孔急，鐵路運輸是以軍事為優先，印刷機器根本是不被考慮的，我為了運輸這些機器，在沿途所遭遇的空襲及無故阻在小站走走停停的困難絕非筆墨所可形容，至今思之猶有餘悸，想不到這部機器運到重慶後方還是被敵機炸燬，豈冥冥之中真是有定數耶？這件事除了在民國二十九年筆者供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時，曾向康先生談及外，從來就沒有向任何人說過，這也算是重慶西南日報被炸一段題外的插曲。

見機而作入土為安

當時重慶各報被炸的還有新蜀報及大公報等數家，但不十分嚴重，其他報社鑒於西南日報被炸



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全貌。

之慘，乃紛紛將印報機器及收報機遷往李子壩、化龍橋、小龍坎一帶依山開洞，將印刷機及收報機放在洞內工作，有時電線炸斷，立刻隨斷隨修；到了二十九年的夏天，敵人妄圖破壞我神經樞紐，用極為殘酷的手段，疲勞轟炸重慶，由漢口機場起飛，三架、五架不分日夜循環空襲，那時各報乾脆將編輯、編譯、譯電、繕校各部門工作人員都安置在防空洞內工作，因為通風設備不夠理想，洞內空氣非常沉悶，好在當時的空襲，速度不如現在的飛機，防空系統發出的警報也有空襲警報與緊急警報之分，敵機在漢口一起飛，防空情報所就發出空襲警報，一直到離重慶很近才發出緊急警報，極為準確，當時負責防空情報主管的就是現在台灣曾任警備總部民防處處長的熊覺將軍，他對重慶防空情報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所以在空襲警報時大家都在洞外徘徊呼吸新鮮空氣，聽到緊急警報才從容入洞，好像上班下班一樣，一點也不緊張，在化龍橋有某報的記者他運用成語「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畫一幅對聯貼於洞口，可謂天衣無縫切事切時，真是幽默已極，在重慶各報的外勤記者頗為辛苦，他們跑新聞的時候不像現在台灣有各型汽車及機車配備，因為重慶是一座山城必須上坡下坎，就是有機車汽車

也無法完全利用，他們在空襲中採訪新聞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險，與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前方將士並無軒輊之分，他們責任繁重，待遇清苦，早餐來不及的時候就是一碗豆漿一副油條燒餅，晚間在外執行任務，餓了也祇是一碗炒米糖開水再加兩個鍋魁（燒餅的一種）（重慶入夜到天明街巷都有叫賣炒米糖開水的）中央社和軍聞社的記者更是艱苦，他們的社址均在重慶，各戰區都派有特派員，記者及電務人員，視任務繁簡隨時調節，中央社及軍聞社的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訓練，具備軍事常識，在槍林彈雨的前線，和淪陷區敵人的後方，冒險犯難已是家常便飯，他們與前方的軍事機構均有密切聯繫，發佈的軍事消息，不論國內國外均極受重視，有時盟軍飛機出擊，兩社的記者都有隨機採訪的紀錄，足跡遍及中外戰區，這些在抗戰時期的新聞從業人員謹守崗位的敬業和犧牲的精神以及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是值得我們欽敬和效法的。（下期續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肆拾捌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